

22

# 論新中國

平心著



# 論 新 中 國

(抗日戰爭時期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

平 心 著

上海羣聯出版社印行

# 論 新 中 國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平 心

發 行 者

羣衆聯合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二七二弄四號

印 刷 者

錦 章 書 局  
上海太倉路一三五號

本 書 定 價 人 民 幣 一 萬 三 千 元

★ 外 埠 酌 加 郵 運 費 ★

一 九 四 一 年 八 月 (滬) 初 版

一 九 五 〇 年 七 月 (滬) 重 版

一 九 五 一 年 八 月 (滬) 四 版

[1]6001—8000

## 重刊自述

九年前，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也是國內民主和反民主鬥爭最尖銳的時期。當時各地出版的進步書刊廣泛反映了這幕非常緊張的史劇。我也追隨在朋友們之後，寫了「論新中國」這本小書。刊行時用的筆名是青之。副題是「中國的現在與未來」。最近重刊，決定改爲「抗日戰爭時期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以標明全書的中心內容。現在校完了全書重排樣子，回憶當年初次看到新民主主義曙光的心情，不能不略略敘述一下這書產生的經過。

一九四〇年「新民主主義論」初次出現在上海。在黑暗重圍中和敵人搏鬥的「孤島」朋友們，看到了這來自西北的巨大閃光，不禁交換着噴泉似的喜悅。讀了這本中國人民大革命的新經典，歡喜讚歎之餘，我寫了「新中國的道路」。毛主席的響亮號召，使我堅信新民主主義的全國性勝利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當時我在這篇論文中寫了下面的話：

「只在革命力量發展到了對反革命力量——首先是日寇的力量——佔決定優勢的時候，

才會在全國範圍內使中國政治經濟發生質的突變，那時一個全國性的新民主共和國將要出現。」（「論新中國」初版一三頁、新版一五頁）

『不管遭到如何的艱困險阻，抗日民主根據地將在中共領導之下，用革命力量排除萬難，發展成爲新民主共和國。』（同書初版一四頁、新版一六頁）

『在這時期，無產階級自然成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決定動力。這個階級雖然在物質力量上非常貧弱，但靠了他的革命路線和政治影響，團結了最廣大的民衆在他周圍，創造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因此他的政治力量日益壯大起來。……抗戰愈向前發展，階級的比重與結合必愈向有利於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向變化；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也就愈帶有決定的意義。』（同書初版一六頁、新版一七——一八頁）

『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力量的生長，是任何迫害，任何「圍剿」所遏制不了的。正是它，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路線，正是它，爲改變舊中國創造新中國領導億萬民衆艱苦奮戰。任何階級與階層，任何政治集團，任何民主隊伍，只有與它親密合作，才有前途。那些反共的民族渣滓妄想改變歷史的進路，適足以召致毀滅。』（同書初版四九——五〇頁、新版五六頁）

這當然並不是我個人的預見，而是根據當時毛主席指出的中國革命發展總規律所作的一點粗淺推論。我不過做了一名幼稚園的學童牙牙學舌，在千百萬戰士響應新民主主義號召的大合唱中留下了一點稚弱的聲音。今天人民革命的輝煌勝利，證



實了毛主席當年所揭示的革命真理，具有堅銳無比的歷史穿透力量。

對於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的中國革命形勢，「新中國的道路」作了如下的推測：

「不過就是到了那個時候（指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平心），國內國外的反革命障礙還是很多的。必須經過相當繁重的鬥爭，才能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同書初版二五頁、新版二九頁）

「抗日戰爭的勝利也並非宣告整個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終止，那時將要在新的民族鬥爭中解除中國對帝國主義的隸屬。」（同書初版九頁、新版一一頁）

「中國革命不一定要在世界革命勝利後才能成功，它可以首先取得勝利。」（同書初版一七頁、新版二〇頁）

「新中國的道路」主要的是研究新民主主義和新中國前途，這些研究是從毛主席所指示的基本原則出發的。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當時作了一點簡單的解說：

「對於反革命者是嚴格的專政，而對於革命民衆則是高度的民主，絕大多數人對於極少數反革命份子的專政，這就是抗日民主專政的實質。」（同書初版二八頁、新版三二頁）。

「這個新民主共和國，如前所說，是建築在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上。不過，工農將在政權上佔極重要的地位（今天應說工農同盟是新民主政權的基礎——平心後記），而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權也將隨革命的發展而提高。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並不是要包辦政治；各個（民

「主」階級（「民主」二字是重版時所加，下同）和各個「民主」黨派將經過普通的、平等的、直接的選舉參加政府與民衆代表會議（今天應稱「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平心後記）。」（同書初版三二頁、新版三六頁）

「如果有人以爲這是烏托邦的理想，那就讓歷史來證明，究竟是一黨專政（指國民黨反動專政——平心）成爲未來的統治形式，還是新民主專政統治未來的中國。」（同書初版二九頁、新版三三頁）

對於抗日戰爭與民主建國的前途，當時一般愛國文化工作者都抱着很大的樂觀。我在「新中國的道路」中大略分析了決定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勝利的國內國際因素，其中特別說到：

「民族的苦難和抗戰的洪流激起了廣大民衆的覺醒。民衆在實際生活中容易認識誰是真正代表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誰是奴役中華民族和壓迫中國人民的。他們必然擁護進步的勢力，抗拒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在華走狗，反對各式各樣的倒退勢力。民衆的這種趨向將決定一切。」

四年來的戰爭使中國社會在加速變化，舊的力量（逐漸）倒下去了，但代替它而起來的，是新的民衆力量和革命力量。這種曠古未有的民族鉅變是任何反動勢力所控制不了的，只有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無產」二字是重刊時所加——平心）及其領導者能够引導中國社會向光明的前途變化。」（同書初版五一頁、新版五七——五八頁）

在分析了抗戰和革命的各種有利因素之後，我得出了一個結論：

『三年前毛澤東先生已經預見了鄉村戰勝城市的條件，這些條件今天是在往前發展之中，這就足以保證我們能夠經過持久的民族戰爭，走向全面勝利。』（同書初版五二頁、新版五八頁）

除了國內的有利條件之外，當時還有國際的有利條件，本文特別說到：

『帝國主義戰爭（當時德國還未進攻蘇聯，蘇聯沒有參戰，依據共產國際的分析，那時的歐洲戰爭是屬於帝國主義戰爭的範疇——平心後記）必然要造成世界革命力量發展的（新）環境，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資本主義國內無產階級勞苦大眾反法西斯蒂、反資本剝削運動的發展，和殖民地、附屬國的被壓迫民族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加強，將劇烈動搖帝國主義在世界的統治，增大對中國革命的聲援。』（同書初版五二頁、新版五九頁）

『中國革命發展的最有利的一個國際條件，是鄰近蘇聯。這個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過去給了中國以巨大的援助，今後必然給予更有力的援助。這因為蘇聯的國力對比着帝國主義列強，呈現驚人的增長。其次，中國革命對於世界革命的重要性日益加大，使蘇聯必定增進與中國人民的友誼合作。中國人民不但在抗日戰爭時期要得到蘇聯的援助，在將來建設新民主共和國的時期，也一定要得到蘇聯的幫忙。』（同書初版五二——五三頁、新版五九頁）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國民黨反動派配合日寇圍攻有東南抗戰支柱之稱的新四軍，造成了震動全國和世界的皖南事變。上海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和愛國民主人士在



萬分憤慨中表示了嚴正的抗議，並召集了好幾次討論時局問題的座談會。我寫了「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發表在「求知文叢」。第六節是「從明末黨爭說到今日國事」，其中有一段說：

「皖南新四軍奉命移防，被預先埋伏的七倍於他的大軍「聚殲」以後，以落井下石爲榮者對「異黨」的口誅筆伐，是回復了戰前先安內後攘外的「圍剿」姿勢。參加「圍剿」的某大報（記得是「中央日報」——平心），於照例敷說了一頓共黨「罪惡」後，忽然大背其史論，引徵明末史事，論證黨爭足以亡國。我還有一點歷史常識，沒有被旁徵博引的高文宏議所嚇倒。但人總是辨得出是非黑白的；看到有些論客，一面對勇於內戰的反共狂潮推波助瀾，一面又向憤慨惶惑的全國民衆痛詆黨爭，總苦於不能壓住沈痛的滑稽感，做一個箝口結舌的活死人。而聯想作用偏又古怪得很，它使我的心不能有片刻寧靜；一想到屠戶們的兇橫和烈士們的死難，就禁不住記起了二三四百年前（指清初）官逼民反的漢族血淚史。」（同書初版一三三頁、新版一五一頁）

「凡是用右腳踢共的「好漢」，他的左腳遲早難免陷在降日的泥坑中……。侵略者及其公關傀儡只要能夠達到反共目的，他們就不用擔心中國抗戰。因爲他們知道得太清楚，反共、投降、滅亡，乃是中國頑固派必然要唱的三部曲。」（同書初版八七頁、新版九九——一〇〇頁）

「抗戰造成的鉅大變化與進步任何力量也不能推翻。……」

就人民革命勢力來說。首先，就不難看得出，經過了多次的歷史教訓，尤其是經過了這次抗戰洗禮，全國民衆是比以前覺悟得多，進步得多。侵略者的麻醉政策與頑固者的愚民政策，全不能遏住中國人民革命性的生長。事實可以教訓他們去辨清是非黑白。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分裂與投降，熱烈地擁護正確的革命領導。民衆的覺悟力量與團結力量，使侵略者漢奸不容易施展分裂抗日戰線的陰謀，使一切親日派與反共派在進行反共走向投降的道路上，碰到絕大阻力。其次，要着重指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中共比大革命時代是老練得多，強大得多了。因爲它積聚了二十年來的革命戰鬥經驗，清算了過去多次的政治錯誤，排除了機會主義的領導份子，鍛鍊了千萬精銳英勇的革命幹部，武裝了五六十萬工農羣衆，創造了遼闊的革命根據地。不論是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組織那一方面來看，這支朝氣勃勃的先鋒隊，都是突飛猛進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所堅持的抗戰、團結與進步的革命路線，所追求的獨立、自由、幸福的奮鬥目標，已經深入全國廣大羣衆中間，成爲中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與人民解放的有力保證。這個和人民血肉相連的勞工前衛隊，這個生活於艱苦戰鬥中的革命突擊隊，這個百鍊成鋼的民族選手團，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戰勝的。第三，特別要指出，爲中共所創建所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作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有力支柱。那漫山遍野的民衆武裝力量（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民衆抗日自衛武裝），那精銳無比的新民主主義政權，就是依托這些根據地發展着，生長着。正因爲抗日民主根據地的規模、組織、聯結及其對全國的革命影響在飛速擴大和加強（見本文第三節），所以，它們能担负起決定全國革

命勝利的艱巨任務。任何力量都不能取消這些革命根據地，因為「正在產生着與發展着的東西是不可征服的」（斯大林）。無疑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存在與擴展，是中國民族戰鬥與民主運動發展的一個重大特點。反革命者不能從中國革命地圖上抹除這個特點，就休想撼動中國民族的革命柱石，休想衝破中國人民的革命警戒線。

民衆的團結（按指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平心）與戰鬥性的增高，中共的威信與領導力的加強，抗日民主根據地和人民抗日武力的鞏固與擴大，這就是保證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三個基本連環。」（同書初版一八九——一九一頁、新版二〇七——二〇九頁）

這篇文章主要的是根據座談會的總結寫成的，目的在解說當時民族統一戰線的社會基礎和政治領導，分析統一戰線的危機及其根源，說明統一戰線的發展前途。文內盡量暴露了國民黨反動派摧殘民主、危害團結、破壞抗戰及與日寇呼應默契陰謀「劃」共的罪狀（其中有好些材料是反動派的自供狀），駁斥了反動派所加予中國共產黨的種種誣蔑，打擊了當時流行的各種反動政治理論，如「共黨禍國說」（同書初版一一一頁、新版一二六頁，以下簡稱初、新）、「一黨專政和一黨統一說」（初一一五頁、新二二二頁）、「法統說」（初一二二頁、新二二九頁）、「失敗主義與聯帝主義」（初一二五頁、新一四二頁）、「戰時不能實行民主說」（初一二七頁、新一四九頁）、「階級鬥爭妨害抗戰說」（初一二九頁、新一四七頁）之

類的謬說。自然，這些都不是出於我個人的私見，而是概括當時革命權威和愛國人士的意見寫成的。

此外，依據延安中共中央的重要文告，解剖了日寇誘降的陰謀和重慶投降的危險，說明了阻止重慶投降的國內和國際因素；其中最有決定性的因素，是中共領導的抗日革命力量。對於英、美企圖犧牲中國實行對日妥協的計畫也說到了些，雖然分析得不夠深刻。

根據了當時不完全的材料，我略舉實例證明了當時抗日的重心是在延安，抗日和民主的主流是在中共領導的抗日民主區。

這些議論在今天看來，自然都是「卑之無甚高論」，但在當年摸索歷史真理的時候，我的譴陋的分析却是費了一些學習和思索的時間的。我彷彿時刻感到一股灼熱的人民革命力量在啓發我，鼓舞我。我不知不覺寫下了些歷史的鱗爪。假如說這些鱗爪能夠反映一點歷史真實性，全是因為當時正在孕育的新中國向我投射了無限強烈的教育光輝。

這些論文曾經在「求知文叢」（當時由王任叔、梅益諸兄主編）等刊物陸續發表過，用的筆名好像不只一個。一九四一年我把這些文章結集起來，題名「論新中國」出版。封面的字是請王任叔兄親筆寫的。在上海、香港和內地，這書大約銷去

了二千餘冊。這年十二月我改正了初版樣本，準備再版，恰逢太平洋戰爭爆發，匆忙中把兩副紙版交給友人韓近庸兄（即後來的華夏書店經理）保存。後來日僞揚言挨戶搜查反日書籍，爲恐「禍延」藏版友人，我催着韓君把紙版毀去。只保留了兩本初版書做紀念。

現在重印這書，有三點小小意義。第一，這書反映了當時民主和反民主的尖銳鬥爭，證明了抗日和民主的重心是在中共領導的抗日民主區，對於一般讀者了解抗日戰爭和民主運動的發展，也許有些微幫助。第二，這書保留了好些不經見的史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反動派洩露出來的一些秘密文件（由抗日民主區的文獻間接讀到），以及國內國際民主人士報道和評論民主區和國統區的文字，對於研究現代中國歷史的同道也許可以供給些參考資料。第三，這書所作的各種分析和解說是以中共的權威文獻特別是毛主席的論著爲依據的，那時的一些預測和看法和今天的革命情勢似乎基本上還沒有什麼出入，可以勉勵自己繼續跟隨馬列主義的革命隊伍學習。

本書重印之稿儘可能保留原樣，但刪除了末了三篇比較不重要的文章。有些在當時爲應付環境不得已採用的「新技巧」字眼都改正過來了（如「狄後」改爲「敵後」，「遠東帝國主義」改爲「日本帝國主義」，「抗×」改爲「抗日」等等）。



文中節略之處也加了說明。有些暗指的和隱僻的名詞，都添了注解（如「中國佛朗哥」、「某大報」等）。又本書目錄新版較初版詳細，是因為重刊時添列了細目。初版本到現在只剩下一本（比新版多了三篇文章），這書我將盡可能保存，以備朋友們搜集資料時查攷之用，紀念的意義還在其次。（如果有朋友保留十年前出版的「求知文叢」，我願意拿別的書交換。）

本書新添的「論中國現代革命」是最近寫的一篇單獨論文，對於中國革命發展的新形勢，作了一些粗略解說。因性質和本書相近，所以當作代序列入。

最後要感謝重印本書的羣聯出版社。特別要謝謝友人裘柱常兄，他為本書奔走設計，是費了很大氣力的。

平 心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日深夜

本書三版時，趁紙型製成前，「重刊自述」添加了一千多字的引證文，特此聲明。

同年八月八日著者附識

又本書三版付印前，從友人鄭心永先生借得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求知文叢」第十六輯，校讀結果，發見本書第三章第六節漏排一段，特補刊如下：

一五九頁「這是明末慘史驚心動魄的一頁」一段下，應補以下一段：

「三十年間的明末歷史包含了許多血跡斑斑的教訓。使我們吃驚的是，魏忠賢、馬士英、阮大鍼的鬼魂至今仍然附在某些老爺身上。在許多地方，我們不是看到了明末遺風麼？當年，魏、馬、阮以傾陷所謂「邪黨」殘害忠良賢能為能事，今天，親日派與反共派也以排除所謂異黨打擊進步勢力為專業。當年，廟

堂以反天下之是非爲當然，今天，權貴以反民衆之是非爲得意。當年，豺狼當道，以東廠西廠治天下，今天，狐鼠成羣，以特務機關治小民。當年，閹黨與閹黨餘孽用『三朝要典』詆譏正人，今天，親日派與頑固份子用造謠百科全書誣讎異己。當年，馬、阮諸賊於清兵深入時，專與勤王將領抗清義兵爲難，促成閩、浙水火，今天，何顯諸公於日軍壓境時，專與堅決抗戰的軍隊黨派與愛國民衆搗蛋，製造國共摩擦。當年，荒淫帝王與奸臣酷吏橫征暴斂，貪贓枉法，以致餓殍載道，今天，貪官污吏與殘民武夫搜括民脂，發國難財，以致民不聊生。當年，無恥文人助紂爲虐，今天，可殺政客爲虎作倀。當年，疾惡如讎的東林黨、復社君子慘被殺戮，今天，守正不阿的共產黨與愛國民衆橫遭迫害。因此，研究明史者倘要找現成標本，是不用擔心缺貨的。」（以下接『但自然，今天的中國絕非明季的中國。』）

## 初版自序

(原題「開闢我們的新言路」)

在我們這古老的國度裏，「沈默寡言」向來就被當作一種美德稱頌着。歷來頌揚名臣的史傳，常是把這四字和「豁達大度」、「守正持重」等讚語聯在一起的。先前我很疑心這是立傳者溢美之辭，後來纔知殊不盡然。原來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裏，人們的言行是必須塗上濃厚的身分色彩的。爲人臣者對於君上是不敢多言，而對於下民又不屑多言；要想做一個「寡尤」、「寡悔」的好官，沈默實在是一種最有效的保護色。倘有人以爲「沈默寡言」純粹是個人的天性，與實際政治無關，那是把人的性格給抽象化了，弄成空洞無物的東西。時不論古今，在宦海浮沈裏，官兒們即使是一聲不響，也常有他的「政治意義」的。

我並不值個鄙薄「沈默寡言」；假如有一位「言不及義」的仁兄和一位「沈默寡言」的朋友在一道，我是寧願從後者領略寂寞，而生怕從前者聆取教益的。但是，在歷史的解剖刀下，我們看得出，所謂沈默寡言的風度，其實往往是某些閥人們掩飾自己的畏葸怯懦的一層油漆——雖然不可一概而論；剝落了這層油漆，透露出來的本相就只令人覺得可鄙可憐。歐陽修就曾經在致尹洙（師魯）的信內慨然說

過：「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人間，相師成風。」他所說的是宋朝的風氣，但這話未嘗不可拿來嘲諷古今一切抱殘守闕之輩。這種「沈默畏慎」的積習像厚重的淤泥一樣，阻滯中國社會的進步與變革。人們不但不以為可怪，反視為當然。結果是，大家滿足於現狀，習慣於黑暗。其末流是對於萬事萬物不置可否，只是一味唯諾。但求無過，不求有功，正是這一羣人的處世論事之道。倘有人胆敢衝破那籠罩天下的大沈默，他是會給淤泥窒死於寂寞中的。血的經驗告訴官僚士大夫，多言買禍不如結舌保身。於是沈默寡言不但成了習慣的美德，而且逐漸成了傳統的戒律了。

在恩威莫測的專制主義之下，奴才不敢多言，奴隸是不許多言的。「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思不出其位」，是告誡奴隸不要胡言亂語、胡思亂想的聖賢之言。這類聖賢之言確也收到了統治人心的實效，那教澤一直流行到近世。不是連茶樓酒館也高揭「莫談國事」的告白麼？又不是走錯了路也聽到「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箴言」麼？魯迅先生曾經嘲諷過：「造物主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那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是治者階級的最大恨事之一。但是，治者畢竟是厲害的，他們雖不能從無頭的奴隸榨取脂膏，却能退而求其次，那就是用血泊封住小百姓的嘴巴，用古語來說，就叫做「防民之口」；